

#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  
与国际现实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李泽 译 刘丰 校

#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  
与国际现实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John J. Mearsheimer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李泽 译 刘丰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著;李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书名原文: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ISBN 978-7-208-15971-6

I. ①大… II. ①约… ②李… III. ①自由主义-关系-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261.2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39143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周伟伟

##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李泽 译 刘丰 校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4

字 数 244,000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971-6/D·3448

定 价 72.00元

## 推 荐 序

在国际关系学界,约翰·米尔斯海默因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而闻名。这个标签导致许多人对米尔斯海默的立场有所误解,认为他的理论旨在为美国霸权辩护。就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出版后不久,美国在小布什政府的领导下相继发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据此,一些评论者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为当时美国政府具有高度进攻倾向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念指导。

然而,如果考察冷战时期以来美国现实主义学者在使用武力进行海外干涉问题上的立场,会发现一个具有高度延续性的有趣事实:现实主义者总是站在反战的最前列。我们可以从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杰维斯、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等不同代际现实主义学者的论著中读到有关美国卷入重大战争和海外干涉行动的大量尖锐批评,无论这些行动是基于国家利益、人道干涉还是其他名义。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33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自费刊登一则题为《伊拉克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广告,其中多数

人是旗帜鲜明的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为何大多是美国霸权的批判者，而不是鼓吹者？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这部新著中，米尔斯海默自己给出了系统而清晰的答案：美国建立和维持霸权秩序的企图建立在自由主义这一并不牢靠的理念基础之上，违背了国际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将这种理念推向海外必然招致失败的结局。

在这本书中，米尔斯海默并没有将批判焦点集中在经验事实上。他希望揭示美国霸权及其扩张动力背后的思想根源——自由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剖析其根本缺陷，从而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思想基础和战略实践发起致命一击。读者们可以发现，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政治哲学层次的探讨，米尔斯海默用了大量篇幅厘清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和核心概念，辨析其主要分支在理性的范围与限度、个人权利的内容与实现条件、国家在国内外开展社会工程的能力等重大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驳斥当代流行的三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现国家间和平与合作上的乐观态度，最后才转向对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国际国内后果的分析。

米尔斯海默的核心论断是，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与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这一基本事实，个人生活在由无政府逻辑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的范围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理念为理解国际政治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前者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生存忧虑和国家间互动的均势逻辑，后者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特性的

重要性。当一个国家,即使是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试图将自由主义拓展到海外时,也会遭遇均势逻辑和民族主义的强烈抵制。如果以暴力的方式推广自由主义理念,不仅会破坏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还会消耗霸权国自身的国力,陷入过度扩张的困境,反噬其国内的自由民主制度。

十年前,在米尔斯海默着手本书的写作之际,美国战略界对维持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还抱有高度的热忱,对这一秩序所依托的自由民主体制、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国际制度的积极效应满怀信心。今天,我们不难发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本身及其三大支柱都或多或少出现了松动,而学术界也越来越多聚焦于这一秩序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出现瓦解的前景。米尔斯海默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根源、表现及其缺陷的批判是深刻而富有见地的,对于理解当今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的调整 and 变化有着很强的启发意义。

米尔斯海默的著述有着文字简练、直截了当和逻辑严密的鲜明特点。学术翻译并非译者自我创作的过程,而是在理解著作本身所涉及的背景知识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对作者的原意进行有效转换。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充分理解原文,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准确加以传达。至于米尔斯海默的学术观点是否有效,理论推理是否适当,读者们应当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对于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与实践以及当今国际政治现实而言,这是一部具有理论深度的必读之作。

刘 丰

2019年7月20日

## 中文版前言

所有中国人都有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动机的强烈兴趣。毕竟,北京和华盛顿当前正展开一场危险的安全竞争,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还会加剧。许多中国人可能会困惑,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为友好和合作的中美关系在 2017 年为何突然严重恶化,如今到了让两国陷入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地步。

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中,我的首要目的是解释美国在后冷战时代(1990—2016 年)为什么会采取一种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霸权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本书的分析也有助于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冷战最后 15 年里以及在整个后冷战时期很大程度上保持良性发展,以及为何在 2017 年开始急剧恶化。<sup>1</sup>

人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是,2017 年 1 月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总统要为中美之间新的不友好关系负责。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两国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结果。尤其是在 2016 年前后,世界已经偏离单极的体系结构,全球力量对比的这一变化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 理 论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的核心论断是，处于两极或多极体系下的多个大国与处于单极体系下的唯一大国在行为方式上会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关系到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三类体系下的大国行为。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大国没有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彼此之间展开安全竞争。它们的目标是以牺牲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权力，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确保权力的天平不会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变。原因很简单：因为生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无法确信其他国家的意图，它们极其热衷于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强大，由此使自己的生存前景最大化。这一逻辑可以解释大国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为何会展开安全竞争，我之前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此作了详尽讨论。<sup>2</sup>

然而，在单极世界中，唯一大国不必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只因为它的生存得到了有效保障。它是如此安全，因为没有其他大国——依据定义——对它构成威胁。实际上，大国政治不适用于单极体系，因为体系中只有一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敌对大国展开安全竞争。如果唯一的极国家高度信仰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对外征伐的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

简而言之,与两极或多极相比,单极体系下的国际政治截然不同。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的核心论断不太适用于解释美国在单极时刻的外交政策。《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 历 史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是国际体系中仅存的两个大国,它们从始至终都在进行一场严酷的安全竞争。在冷战初期,中国与苏联结盟,与美国是宿敌。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恶化,最终完全破裂。70年代,美国明智地利用这一发展,与中国建立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一共同对手。

1989年,冷战结束。两年之后的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体系走向终结,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单极体系。当然,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是唯一的大国,这意味着它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全世界开展社会工程,从而根据美国的意向塑造世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将自由主义霸权当作自己的外交政策。

这一野心勃勃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在全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建立强大有效的国际制度。本质上,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彼此之间开展经济往来,受到一系列共同规则的约束。其潜在假定是,世界按照这种方式构造会在很大程度上远离战争,带来

普遍繁荣。

单极时刻的美国对华政策也符合自由主义霸权的目标。美国决策者相信，与一个崛起的中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关键是与之接触，而不是像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进行遏制。人们普遍认为，接触会让中国积极加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制度，也有助于让它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富裕。反过来，这些发展会让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中国会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有强烈的动机维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

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使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事态在 2016 年左右发生变化，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体系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的第一年就明确表示，大国竞争再次成为现实，“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挑战，意图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sup>3</sup>。

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多极世界中，美国显然是三个大国之中最强大的，俄罗斯是最弱的。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但是没有美国强。但是，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在崛起的快车道上，有理由认为它会强大到足以像美国主宰西半球那样主宰亚洲的地步。不过，美国决策者不会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正因如此，美国已经开始转向遏制中国。这一动态变化，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很可能会加剧，会导致两个国家展开高调的经济和军事竞争。

总之，中美关系自 2017 年以来显著恶化，可能还会持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力量对比从单极转向多极。尤其是，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在美国愚蠢的推动下，导致两国会变成像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那样的对手。

## 民族主义

中国读者应该会对《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本书用很大篇幅讨论了民族主义——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大国有强烈的倾向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在战略上是有意义的。然而，需要理解的是，民族主义导致大国很难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目标国家的政治。我的这本书极其详细地展示了民族主义在挫败自由主义霸权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战略家和决策者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是一个警醒。民族主义的阻遏力量不应被低估。

约翰·米尔斯海默

2019年7月21日

### 注 释

1. 我建议对《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所讨论的议题感兴趣的读者读一下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3, No.4 (Spring 2019), pp.7—50。这篇文章在一些重要方面与本书形成互补。

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New York: Norton, 2014).

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7, p.2.

## 英文版前言

当十年前动笔写作这本书时，我对本书的主题有两种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想要解释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如此容易失败，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我尤为感兴趣的是解释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惨败——这些惨败还在持续积累，以及美俄关系的不断恶化——到 2014 年因乌克兰问题出现严重破裂。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如此乐观，这个主题就变得更加有趣了。我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次，我想写一本关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互动，从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著作。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但我从未详细研究过这个话题。当然，我写了很多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并在之前的几部作品中探讨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我认为写一本比较和对照这三个“主义”的书会很有趣，特别是自从我知道还没有文章或著作这样做过之后。

当我思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三分法提供了一个用来解释 1989 年以来（特别

是2001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为何失败的理想模板。那时,我写这本书的两个理由恰好融合在一起。

我的基本论点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采取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这一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强大的国际制度。从本质上讲,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意象重塑世界。这项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界被广泛接受,支持者们认为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并且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问题。它能够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让自由民主国家更加安全地抵御内部威胁。

然而,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这项战略总是会产生一些让这个国家背离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但后者最终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外交政策精英对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抱有近乎下意识的敌意。但这种思维只能导致外交政策上的麻烦。美国决策者应该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基于现实主义奉行更加克制的政策,恰当地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对大国形成约束。

这本书更深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1976年秋天,我参加了艾萨克·克拉莫尼克(Isaac Kramnick)教授讲授的政治理论专题研讨。这门课向学生们介绍了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等开创性思想家们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我参加的任何其他课程都

要大。事实上,我仍然留着这门课的笔记,这么多年来我至少查阅过五十次。

这门课有三个方面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第一,我学到了各种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且这门课对它们作了相互对比。第二,这门课教会我理论对于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之所以反复参考课程笔记,是因为我记得那些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对当代政治问题有重大影响。第三,我认识到,人们可以用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简明语言来讨论和书写重要的理论问题。虽然通常很难弄清楚我们阅读清单上的著名理论家究竟在说什么,但克拉莫尼克教授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讲解他们的理论,不仅使它们易于理解,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为什么重要。

《大幻想》旨在以理论为核心。本书的基本前提是,理论对于理解政策问题至关重要。但是本着艾萨克·克拉莫尼克的精神,我已经尽力清楚地阐明我的论点,以便任何受过良好教育和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够掌握它们。坦率地说,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不错的沟通者,而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当然,只有读者才能确定我是否做到了。

如果没有许多智者的帮助,我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我最想要感谢的是四个人,他们的印迹遍布全书。他们分别是伊丽莎·格奥尔基(Eliza Gheorghe)、玛丽亚·格林伯格(Mariya Grinberg)、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他们不仅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观点,使我改变了一些特定论述,而且还发现了我忽略的矛盾之处,并就如何重新组织章节以及书的整体结构提出了明智的建议。

在我提交耶鲁大学出版社之前，书稿历经五次重大修改。2016年11月，在第二份重大修改稿完成之后，我参加了一次书稿研讨会，其中有来自芝加哥大学以外的六位学者——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马修·科克(Matthew Kocher)、约翰·欧文(John Owen)、塞巴斯蒂安·罗萨托、斯蒂芬·沃尔特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他们非常友好地阅读了完整书稿，花了八个小时进行详细批评。他们在研讨会以及随后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交流中的反馈促使我作出了大量修改，其中一些是根本性的。

那次书稿研讨会的其他参与者，包括我的好朋友托马斯·德金(Thomas Durkin)，给了我关于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如何威胁国内公民自由并推动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发展的明智建议。我还有幸邀请到芝加哥大学的全体国际关系同事——奥斯汀·卡森(Austin Carson)、罗伯特·古洛蒂(Robert Gulotty)、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罗伯特·帕普(Robert Pape)、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迈克尔·里斯(Michael J. Reese)和保罗·斯塔尼兰(Paul Staniland)参与讨论。他们也提出了极好的评论，帮助我收紧了一些论点，也迫使我修改了其他的论点。

我非常感谢肖恩·林恩-琼斯(Sean Lynn-Jones)，他通读了书稿并给了我一套详细的评论，帮助我完善了手稿的最终版本。我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威廉·弗鲁赫特(William Frucht)，他在编辑最终版本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推动我努力收紧某些论点，同时他还精简了所有这些论点，让这本书更易读。在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的帮助下，利兹·许勒尔(Liz Schueler)做了很好的编辑工作，卡伦·奥尔森(Karen Ol-

son)高效而愉快地处理了后勤事务。

还有许多其他人帮助我——有些在小的方面、有些在大的方面——完成这本书,包括塞纳·阿克蒂尔克(Sener Akturk)、泽伊内普·布卢特吉尔(Zeynep Bulutgil)、乔恩·卡弗利(Jon Caverley)、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布拉克·卡德肯(Burak Kadercan)、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珍妮弗·A.林德(Jennifer A. Lind)、加布里埃尔·马雷斯(Gabriel Mares)、马克斯·米尔斯海默(Max Mearsheimer)、尼古拉斯·米尔斯海默(Nicholas Mearsheimer)、拉詹·梅农(Rajan Menon)、努诺·蒙蒂罗(Nuno Monteiro)、弗朗西丝卡·摩根(Francesca Morgan)、瓦莱丽·莫克维希斯(Valerie Morkevičius)、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桑卡尔·穆图(Sankar Muthu)、戴维·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林赛·奥罗克(Lindsey O'Rourke)、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Parent)、唐·雷诺(Don Reneau)、玛丽-伊芙·雷尼(Marie-Eve Reny)、迈克尔·罗索尔(Michael Rosol)、约翰·许斯勒(John Schuessler)、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盛玉冰(Yubing Sheng, 音译)、汤姆·斯威策(Tom Switzer)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

我要感谢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和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他们邀请我参加2017年的亨利·L.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讲座。我在耶鲁大学的三个讲座实际上是本书的核心要素。我还要对芝加哥大学表示感谢,35年以来它一直是我的学术之家,并且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慷慨的支持,这些研究不仅产生了这本书,而且实际上几乎产生了自1982年我开始在那里担任助理

教授以来所写的所有东西。此外，我要感谢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基金会资助我的研究和书稿研讨会。我特别感谢其研究副总裁威廉·鲁格(William Ruger)的支持。

多年来，我一直很幸运拥有一流的行政助理，他们不仅帮助我处理作为教授和学者的日常后勤需求，而且还为我作了大量的研究。梅甘·贝兰斯基(Megan Belansky)、埃玛·奇尔顿(Emma Chilton)、索维克·德(Souvik De)、伊丽莎白·詹金斯(Elizabeth Jenkins)和迈克尔·罗利(Michael Rowley)都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并为这本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也很感谢我从我的家庭得到的所有支持，尤其是来自我的妻子帕梅拉(Pamela)的支持，她从未抱怨过我花在写作和重写书稿上的无尽时光。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多年来教过的所有学生，我的教学生涯可以回溯到1974年我在纽约州北部的莫霍克山谷社区学院教授的第一门课程。我在这里在最为广义的意义上使用“学生”这个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上过我的课程，但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助于塑造他们的思维的人。我喜欢教学，因为通过向学生传授知识，帮助他们提出自己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论，我感到非常满足。

与此同时，多年来我从与学生的互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讨论课，我经常在课堂上以一种方式思考课程提纲里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离开课堂后却因为学生们说的话而以另一种方式去思考它。主讲大课也是一项重要的学习经历，因为它迫使我去组织对宏大主题的思考，并弄清楚如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它们。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多年来与学生一起教学和工作有助于塑造我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这些都反映在本书的每一页中。我对此永远感激不尽。